

歐洲語言學說簡述

“俄文教學”編輯部編

商 務 印 書 館

欧洲語言学說簡述

(19 世紀至 20 世紀)

傑格捷列娃著

商 務 印 書 館

1958 年·北 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俄文教學”雜誌連載過的“歐洲語言學說簡述”一文的單行本。作者扼要地介紹了 19 至 20 世紀歐洲語言學說的各個學派，並對它們的論點加以批判。本書可供研究歐洲語言學說的讀者參考。

歐洲語言學說簡述

(19世紀至20世紀)

傑格捷列娃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1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107 號)

新 華 書 店 總 經 售

五十年代印刷廠印刷 紅旗裝訂廠裝訂

統一書號 9017·32

1958年12月初版

開本 787×1092 1/32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數 68,000

印張 1—11/16

印數 1—1,800

定價 (10) ¥0.24

19 世紀語言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發現了歷史比較法。有了這種方法才可能對於語言事實的獨特性和特點作嚴格的科學解釋和正確的分類。這個方法使得我們有可能提出和解決許多複雜的語言學問題，特別是親屬語言關係問題、每種具體語言發展的分期問題，並且對於了解語言發展的一般的和特殊的規律非常有幫助，只有借助於歷史比較法才能夠正確地、有科學根據地解讀古老的早已死亡的語言，從而增加了我們對各民族古代歷史的知識，更加豐富了關於語法和詞彙語義過程（特別是印歐語系的）的知識。而最重要的是，只有借助於歷史比較法才有可能建立個別語言和語羣的科學歷史。歷史比較法的出現，對於語言學這門獨立的科學的發展無疑是一個強大的推動力。語言學史上的一个新的、極重要的階段正是從這裡開始的。

歷史比較法的發現不是某一個國家的事情。比較各種不同語言這個想法，是因為有共同的前提而在若干國家同時產生的。這個前提就是 19 世紀初葉在歐洲已經收集了一些關於古印歐語的材料，並且在這一時期科學知識的發展水平也大致相同。最初只是在某些詞的語音和語義相似的基礎上來比較語言，而對於語言的形式不作歷史的分析。如 1811 年出版的一位佚名的俄國作者寫的“論梵語和俄語的相似”（О сходстве санскрит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русским）一書就是一例。在這一類的著作中還談不到制訂一些正確的有根據的標準來確定語言的親屬關係和斷定所比較的許多語言共同具有的某些個別語言現象的原始形式。因此，對於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發展來說，這些著作的意義有限，就是只收集了一些對於深入分析和作重要概括時所必需的語言事實。

19 世紀 20 年代的一些語言學著作中才有了歷史比較地研究語言材料的經過嚴格論證的方法和原則。如丹麥的語言學家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所著“古代北方或冰島語言

起源的研究”(Uundersögelse om det gamle Nordiske eller Islandske Sprogs Oprindelse). 这是 1814 年作者在論文竞赛时發表的, 于 1818 年出版; 德国学者弗朗茨·葆朴 (Franz Bopp) (1791—1867) 所著“論梵語動詞的變化体系与希腊語、拉丁語、波斯語、日尔曼語的動詞变化比較”(Ueber das Conjugation 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 (1816年出版); 俄国語言学家 А. X. 沃斯托柯夫 (А. X. Востоков) (1781 — 1864) 的著作“論斯拉夫語言 (斯拉夫古文献語法序論)” (Рассуждение о славянском языке, служащее введением к грамматике сего языка, составленной по древнейшим оного письменным памятникам) (1820 年出版) 以及雅柯勃·格里木 (Jacob Grimm) (1785—1863) 的“德語語法”(Deutsche Grammatik), 該書第一卷于 1819 年出版。

这些著作給历史比較語言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这些著作一致認為語言的比較应当首先建立在分析語法形式的基础上。如果它們的語法形式根本上相近, 那么就可以設想这些語言有同族关系。至于詞彙方面的情况, 如果个别詞之間有对应的关系, 也不能認為是同族关系的可靠証据, 因为这很可能是由于講这种話的民族存在的某个时期借用外来詞的結果。在确定亲屬語言关系的时候詞彙的对应只有在断定語法詞素(前綴、后綴、詞尾)有确切对应的情况下才被作为补充材料来利用, 同时还应当首先利用具有最簡單最古老的意义的根詞。葆朴、拉斯克、格里木、沃斯托柯夫这几位历史比較語言学最初的代表者在他們的著作中指出必須要对語言的語音方面作詳細的历史的分析, 这一点尤其重要。在現代語言中詞的語音上的相似可能是不可靠的, 可能是在这些語言發展的过程中后来才产生的, 有时甚至是偶然的巧合。所以必須要追溯这些个別的音組在一种語言里或一組亲屬語言里長期存在过程中的發展情况。經過这样的分析, 就能够弄清楚一个語族里或每一种語言里語音变化的一些規律。历史比較語言学中最重要規則就是要遵循这些規律。于是在語言学的历史上首先在印欧語系个别語族的語音發展中弄清并确定下了一些規律。例如拉斯克和格里木确

定了日尔曼語輔音轉移的規律，這一規律起作用的結果使得日尔曼語在印歐語系里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語族。另一方面，根據這個轉移的規律使我們有可能在日尔曼語和印歐語系其他語族的語言的外表不相同的詞和形式中找出它們的同族關係，如德語的 acht (八) 和俄語的 восемь，英語的 water (水) 和俄語的 вода，英語的 father (父親) 和拉丁語的 pater 等等。格里木發現了古高德語輔音轉移的規律，這種輔音的轉移使得高德語具有不同於低德語方言和其他日尔曼語言語音構造的特殊的語音特點。

談到日尔曼語的輔音轉移，必須說明：在阿尔明尼亞語、奧塞丁語、赫特語中也有類似的轉移情況。那麼，在這些特點如此不同的印歐語言中都有這個特殊的語音過程，是否有它共同的原因呢？這個問題在科學中還沒有獲得滿意的解決。

研究語音的規律就能夠把印歐語系中親屬關係更近的語言劃分為一個個的語族，並且能夠確定個別語言發展的分期。例如沃斯托柯夫就確定了斯拉夫語的，特別是俄語的歷史分期。沃斯托柯夫利用他對斯拉夫語的語音結構（至少是對“юс”）光輝的歷史比較分析的成果第一次在斯拉夫語言學的历史上試圖確定斯拉夫各語言相互關係的特點以及各個語言對古斯拉夫文學語言的接近程度，而且有一定的成效。同樣，格里木把歷史-語音的標準作為德語歷史分期的基礎：輔音的第二個間歇使得古高德語從西日尔曼語支中區分出來。古高德語時期的特點首先是非重讀音節完全不發生元音的弱化；在 12 世紀以後的書面文獻上所看到的非重讀元音弱化的情形是劃分中古高德語時期的主要根據；而在 14 世紀的書面文獻上所看到的古二合元音的緊縮和長元音的二合元音化則被認為是近代高德語時期的特點。儘管這種分期法又為後人更仔細地修訂過而使它更加確切，但是歷史-語音標準仍未失掉它的頭等重要性，這並不是偶然的。語言的歷史分期不可能把語言發展的一切方面的情況都同時拿來作根據，因為語言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就必須有它的穩固性，而這種穩固性又是依賴語言各個要素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同時性的。當語言的某一種質處在變化過程中的時候，這種變化就被語言其他質的相對穩定性所均衡，這樣說不會引起語言功能的那怕是最小的中斷，也不會稍許減弱語言的交際力量。比如說，

詞彙中的某一部分有了大量的補充，那麼新詞就加入了旧的很早就
在語言中巩固下來了的詞的行列中去並按照習慣的語法規則組織起來，
它們很容易表現出自己的意義而並不使人難於理解，如某種語法的質
發生了變化，那麼這種變化的過程是非常緩慢的，而且是按照逐漸地
改變旧質的意義的途徑進行的，同時語法的其他的質仍處於穩定的狀
態。正因為如此，新出現的東西才不致於破壞交際的功能。

正因為語法的質的發展的這種不劃一性和不同時性，而且這種發
展非常緩慢，所以語法的標準對於語言史的分期來說幾乎是完全不適
用的。

必須說明，由於某些語言的發展有其特點，所以在對這些語言進
行分期時有時也利用語法標準，例如，從古伊朗語過渡到中古伊朗語
的狀況，就是以語法特徵為其特點的。詞尾變化的破壞以及語法關係
的表達法從綜合走向分析。然而，這些語法變化的起源仍是語音的因
素：詞形變化成分在語音上的瓦解。這種情況在日爾曼語的材料中特
別明顯。

詞彙的標準也是不適合的，因為在語言存在的一切時期詞彙的增
長都是相當迅速的，而且沒有明顯的依據點來對語言的發展進行分期，
更不能把社會結構拿來作為語言歷史分期的標準，因為語言的語法和
語音結構中的變化並不依賴於社會制度的更替。

這樣看來，只有貫穿著整個語言的一切詞、一切形式的語音變化
才能在延續一個相當的時間以後使語言具有一些為研究者易於察覺的
新特點。這些涉及到廣泛語言材料的語音變化造成了許多標誌，它們
有助於語言學家區分語言發展中的各個時期。處在兩個大的變化之間
的語言狀況可以作為一個統一的整体來研究，來描寫，並且可以假定
為語言發展中的一個階梯。

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創造者們的特點是力圖提出異常重要的語言學
問題並且力圖勇敢地廣泛地概括語言事實。許多他們所解決了的問題
又被後代的語言學家們所推翻了，而有許多問題牢固地進入了學科之
中，成了語言科學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例如沃斯托柯夫在他 1831
年出版的“俄語語法”(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中勇敢地擺脫了
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研究語法現象的形式邏輯的公式。沃斯托柯夫詳細

地研究并仔細地比較了不同的口語和文學語言中的語言形式，廣泛地運用民間的活的口語的事實，同時也不忽視同族語的材料，因而在句法學的历史上第一個斷定：俄語中雙成分的句子結構占優勢，這是俄語的特點。這個事實在句法方面是個很重要的發現。因為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观点是認為任何語言中的任何句子都和邏輯的判斷相適應，永遠具有三個成分，就是：主詞——述詞——系詞。例如和沃斯托柯夫同時的當代最大的比較語言學家弗朗茨·葆朴花了很多的精力來證明沒有動詞——系詞的句子一般是不存在的。葆朴不顧語言事實而提出這樣一個理論，認為每個動詞不管是隱蔽的形式還是開放的形式都包含有表示存在的動詞的因素。他想在每個動詞之中發現動詞 *быть* 的因素。這種企圖自然是不成功的。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大多數動詞中都有省略的緣故。

沃斯托柯夫的句法观点對於後來研究俄語句法的學者們發生了很大的影響。B. B. 維諾格拉多夫院士對於沃斯托柯夫的句子雙成分學說給了很高的評價，他正確地指出：“對於俄語中最常用的雙成分句或‘雙語部’句的結構的新的理解是和 A. X. 沃斯托柯夫的名字分不開的。這種關於句子結構的新观点不能不反映在對於動詞範疇、形容詞的短尾形式以及謂語副詞的一般的解釋上面。”^①

這樣看來，正確地理解句子的結構對於研究許多非常重要的語法部分有着巨大的意義。

黏着理論的研究也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先輩們的一件大功績。這一理論是和弗朗茨·葆朴的名字分不開的。他的名作“梵語、曾德語、阿爾明尼亞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古斯拉夫語、俄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 des Sanskrit, Send, Armenischen,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Litauischen, Altslawischen Gothischen und Deutschen) 一書從 1833 年開始出版，到第三版的時候裝訂成三大巨冊。在這部書里葆朴給自己提出了一項

① 維諾格拉多夫：《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А. X. Востокова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見《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Отдел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языка, 第 10 卷 第 2 期, 第 121 頁, 1951 年 2 月出版。

異常困難的任務，就是利用比較的材料和對親屬語言進行比較來確定語法形式的起源。

葆朴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當然就不能夠死守着舊的、缺乏根據的理論：詞根的內部變化是詞尾的唯一起源。葆朴第一個提出這種思想：外部的詞尾，如果溯其起源，在某個時期它曾經是一個獨立的詞。這一思想對於語言學的研究，對於確定每個語法詞尾的發展情況是一種強大的推動力。葆朴本人極感興趣地着手解決名詞變格詞尾和動詞人稱詞尾的起源問題。他試圖證明詞尾主要起源于代詞。

葆朴的理論是這樣的：任何語法形式的產生都是由於兩個獨立的詞複合的結果，其中一個詞由於處於非重讀的地位而和另外一個詞結合在一起並且逐漸喪失了它的詞彙意義，而這又促進了外形的變化、簡縮。這個理論在以後的語言學家中間獲得了許多人的擁護，然而到 19 世紀末葉對於這個理論又提出了許多懷疑的意見。特別是新語法學派的代表者之一卡爾·勃魯格曼 (Karl Brugmann) 斷然主張印歐語言中的詞尾起源問題是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不必要提出來研究。這種認為不可能解決有關起源問題的悲觀主義論調是 19 世紀末葉語言學中的基本特點。然而到了 20 世紀語言學家們又重新回到了使人發生興趣的語言個別質的起源問題上來。許多語言學家又重新來研究葆朴的詞的複合理論，使它更具體、更確切；而另一些語言學家則試圖對詞尾變化的起源給予新的解釋。這些新的解釋就是所謂“局部化理論”(теория локализации)。根據這種理論，詞尾的構成是利用了個別詞的一部分，這種詞具有作為相應意義的語法範疇的特點的某種意義，可以舉出德語中複數的後綴 -er 的歷史作為“局部化理論”的典型例子(比較 Kind (兒童), Kinder (兒童們))。最初，後綴 -er 並不是複數的標誌，而是為數不多的一些中性的詞的詞身的一部分。由於某種內部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在用於單數第一和第四格的時候這一部分脫落了。這就促使了這個部分區分出來成為複數的形式要素，並且在最初與它毫無關係的詞(即該詞的構造原不包括這個成分)也可以加上這個要素了。

應當指出，無論是詞的複合理論還是局部化理論都能够在事實材料中找到證明。這就說明詞尾變化的構成過程是一個複雜和多方面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交錯着几种發展的道路，所以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应当找出它的特殊的构成方法。

19 世紀上半世紀語言學上的另一个巨大成就是創立了历史語法。在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雅柯勃·格里木，他是第一部个别語言历史語法的編者。

格里木的历史語法思想在 19 世紀中葉著名的俄罗斯語言學家們如 布斯拉也夫 (Ф. И. Буслаев) (1818—1857) 和 斯列茲涅夫斯基 (И. И. Срезневский) (1812—1880) 等人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大的反应。然而这些思想在他們的实际研究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改变，再往后發展就形成了独立的学派。

布斯拉也夫著有“俄語历史語法”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一書，該書于 1858 年出版。在这本書里作者不但广泛地利用了历史的方法，而且也非常注意語法形式的意义内容，这是比格里木的“德語語法”好的地方，在格里木的書里語言現象的意义方面很少談到。

布斯拉也夫支持格里木的理論，認為具体語言历史必須要創造这种語言并在史前和有史时期的許多世紀中作为交际工具来使用这种語言的人民的歷史联系起来研究。布斯拉也夫不但对俄語文學語言作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历史分析，而且对民間的口頭創作及与之有关的問題也进行了研究。在語言學史上第一个注意到必需研究方言和土語的就是布斯拉也夫。这对于俄語方言學的發展是一个推动力量。布斯拉也夫在他的“俄語历史語法探討” (Опыт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一書中写道：“語言學家在沒有人研究过的語言里，甚至在粗魯的地域方言里能够給自己的求知慾找到与經典文艺作品一样的滋養料。对他說来，最不开化的民族的語言就是精神世界的高貴的作品。”^①

布斯拉也夫也比格里木更加正确地解决了語言的本質和語言的發展問題。格里木認為語言不是在發展，而是在后退、在退化。他引用日尔曼語作例子，古日尔曼語拥有丰富和多样化的詞尾变化，而現代日

① 見該書第 14 頁。

尔曼語中这种丰富和多样化的詞尾变化已經消失了。布斯拉也夫的观点是与格里木的語言退化思想不相同的。布斯拉也夫在人民历史發展中看到了进步，同时把語言的历史与人民的历史联系起来，于是断定語言發展也是进步性的。他同样也了解語言交际职能的意义以及語言在其發展中记录人类思维成果这一特点。在上面提过的“俄語历史語法探討”一書的序言里，布斯拉也夫写道：“这門科学（指語言学——本文作者按）不仅把詞看成是互相交流思想的手段，而且看成是人民精神生活的文献，同时是最古老的文献。它的历史在人类智慧的發展史中占着首要地位。”^①

布斯拉也夫的这些思想，超过了后来西方资产階級語言学的各个派別，并且在俄語語言学思想的發展上留下了可貴的痕跡。

斯列茲涅夫斯基也是 19 世紀俄国語言学界的一个傑出的人材，是最大的古文字学家之一。他研究了大量的古斯拉夫語的和古俄語的文字文献。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作了許多有趣而且在当时是最广泛的概括，大部分都包括在他那本理論著作“关于俄語史的意见”（Мысли об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里。該書于 1849 年出版，共印了两版。在这本書里斯列茲涅夫斯基写道：“語言的历史是和人民的历史分不开的，应当把它列入人文科学，而且是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斯列茲涅夫斯基对詞彙特別注意，詞彙是語言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在他的發展中反映着人民生活中多种多样的現象和变革。他写道：“对于历史学家說来，每一个詞就是生活的見證、文献和事实。”

这些話使我們完全了解了斯列茲涅夫斯基特別注意研究古俄語詞彙的原因。他的研究成果都收集在“古俄語詞典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ловаря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这部三卷集的書中。这部書是在他逝世以后才出版的。直到今天，这部書仍然是唯一的一部系統地研究古俄語詞彙的書。

从上面看来，历史比較語言学产生和發展的时代是語言科学中具有丰富的思想和广泛地概括的时代。到了 19 世紀 70 年代又开始了另一个时代，这就是細心地搜集語言事实并仔細地分析和研究語言的

① 見該書第 18 頁。

語音結構和語法構造的細節，而从不提出大的起源方面的問題的时代。語言學史上這個新的轉變鮮明地表現在所謂“新語法學派”之中。

* * *

在新語法學派出現以前，語言學史上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就是所謂比較語言學第二代代表人物的活動時期。這一代最突出的語言學家就是德國語言學家奧古斯特·施萊赫爾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他是語言學中所謂自然主義學派的奠基人。這個自然主義學派把語言看成是生物機體或是生物機能，這是和俄國語言學殊異的，它純粹是外國語言學思想的產物，主要是德國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階段。

在葆朴和格里木的著作里已經看到了語言學的自然主義的萌芽，但是關於語言本質的自覺的、有系統的自然主義的主張還是由施萊赫爾首先發展起來的。19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蓬勃發展對於施萊赫爾有着巨大的影響，此外，他不但從事語言形式和現象的研究和分析，而且也從事植物學的研究。施萊赫爾關於語言的特點和本質規定了三條基本原理：

一、語言是一種自然機體，並且和自然界所有機體一樣按照同樣的規律生存着。

二、因而語言學應當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

三、研究語言的方法也應當和研究植物、動物等的方法一樣，就是說要用自然主義的方法。

我們沒有必要花太多的時間來闡明對於語言本質的自然主義的理解的不正確性和沒有科學根據，因為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事。語言脫離了人類社會是不可能產生的。社會是把語言作為勞動活動中不可缺少的交際工具而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比較詳細地來研究一下施萊赫爾的其他理論性原理。

施萊赫爾認為語言有兩個重要的要素，就是：意義和關係。這兩個要素使得語言有可能作為表達思想的手段。施萊赫爾把這兩個要素分配給不同的語言成分。意義是詞根所具有的，而關係則包括在構詞的和構形的成分中。因此，施萊赫爾根據語言基本要素（意義和關係）相互關係的性質把所有的語言分為三組。

第一組是孤立語。在這種語言中意義是唯一的要素，所以這種語言只有詞根。

第二組是黏着語。在這種語言中關係要素是加在意義要素上的。

第三組是屈折語。關係要素和意義要素構成了一個統一體。

施萊赫爾認為這三種語言類型構成了語言發展的三個時期，他這樣寫道：“一切比較複雜的語言形式都來源於比較簡單的語言形式，語言的黏着形式產生於孤立形式，而屈折形式又產生於黏着形式。”^①

施萊赫爾把語言的這三種類型看成是有機生長的三個階段。他認為孤立語是語言的童年，黏着語是語言的成年和壯年時期，而屈折語則認為是語言的沒落狀態，是語言的衰老時期。

這樣，從施萊赫爾的觀點看來，語言沒有發展史，而有的只是生物式的生長。也就是說，只有植物和動物式的發展，而不是社會現象式的發展。這樣地理解語言的本質必然得出了施萊赫爾的印歐語系譜系樹的理論。施萊赫爾極力把語言與植物界相比擬，於是把印歐語系看作似乎是一棵樹，在初期只是一個樹干，到後來就分出許多枝。母語樹上的各個枝杈就是受共同的根所滋養的語言。同時，施萊赫爾提出了一條原理，就是在比較兩種語言的時候可以通過兩個途徑在它們之中找出一個原始形式：或者它們之中的一個是另一個的母語，或者是在兩種語言材料的基礎上重建出它們共同的母語。下一個時期的語言學選用了第二種方法來建立所謂“基礎語言”。

提出反對語言的譜系樹理論的是自然主義學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約翰·史密特 (Johann Schmidt)，他到後來成了新語法學派的著名人物之一。在“印度日爾曼語中的親屬關係” (Р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индогерманских языках) 一書 (1827年) 中約翰·史密特提出了這樣一種思想：所有印歐語系的語言從最初萌芽的時候開始就是作為方言而存在的。他所反對的基本上是認為語言分化起源於統一的母語分成幾個獨立的語言的這種觀點。約翰·史密特企圖用活的方言材料來證明新的語言的質是以政治上聯結起來的語言地域為中

① A. 施萊赫爾: *K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2. Auflage, S. 4.

心波浪式地扩散开来的。史密特在这个基础上作出結論說，現代的印歐語系的各个語族（如斯拉夫語族、日尔曼語族、居尔特語族等）在共同印歐語中是作为它的方言存在的。为了說明自己假設的正确，史密特認為最主要的証据之一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有書面文献記載的印歐語系的語言分成兩組，一組叫 «кентум»，一組叫 «сатем»（百）。也就是根据有无顎化的 к 和它的变体而分成的。根据这个理論，屬於 «сатем» 組的語言的新質的波浪以亞洲为起点向外扩展，而屬於 «кентум» 組的語言特点的波浪則以欧洲作为波浪式的移动的源地。

史密特的“波浪論”（теория волн）在印歐語言学中是很受欢迎的，一直到有了新的、对語言学的發展說來是划时代的發現为止。这就是在 19 世紀末發現并解讀了赫特語和 20 世紀初發現并解釋了吐火羅語的两种方言。这两种死的印歐語言的發現完全推翻了史密特“波浪論”的主要論据。因为小亞細亞的赫特語和新疆的吐火羅語并不像預期的亞細亞地区的語言所应当具有的 «сатем» 的特点，而是具有 «кентум» 的特点。这样看来，不能說 «кентум» 語的波浪扩展的中心是在欧洲。同样也不可能再保留过去的說法，認為斯拉夫語和波羅的語是波浪的邊緣，它們虽然位于欧洲，但它們是 «сатем» 組的語言。至于阿尔巴尼亞語，也是屬於 «сатем» 組的，但即使从前也很难說它是欧洲的邊緣。所有这些，就使得必須立刻徹底地重新审查主張在印歐語系的範圍內把語言分成兩組的那些陈旧的理論。

所有現代的語言学家——印歐語言学的專家們一致反对这条原理，即反对認為印歐語系的語言分为 «кентум» 和 «сатем» 兩組是由于“原始”的印歐民族地域上的区分而造成的第一次划分。許多學者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說：个别印歐語言中顎化舌根塞音的中断是在不同的时期产生的，并且是彼此不相依賴的。

無論是施萊赫爾的語系樹理論，还是史密特的波浪理論对于語言学的發展都有过很大的影响，但这两种理論的原始形式現在已經沒有人信仰了。对于印歐語系的語言的多样性的权威解釋是三种理論的綜合，即上述两种理論再加上“底層理論”（теория субстрата）。根据这种底層理論的說法，語言的多样性是由于在語言交融过程中战敗的語言影响战胜的語言的結果。

語言學中的自然主義學派特別提倡“母語”(прямой язык) 這個名詞并且極力推廣所謂母語理論。為了反對這種理論我們提出下面幾點意見。

某些具體語言有親屬關係是無可爭論的事實。但是語言的這種親屬關係是由於某些民族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這些語言本身生物式的發展的結果或某個種族生物式的發展的結果。

講着親屬語言的各個民族可能根本就屬於完全不同的種族。由於長期間政治和經濟上有着緊密的關係的結果，人種上沒有親屬關係的部落或部族可能逐漸地（在語言交融過程中）開始講親屬語言。儘管它們最初就沒有血緣關係。

如我們在施萊赫爾的著作中所見到的那樣，自然主義對語言本質的解釋過於簡單化了。當然，它的成就是不可能長久的。代替他的是在選擇與生物比較時更加細緻、更加小心的 M. 繆勒 (M. Müller) (1828—1900) 的理論。M. 繆勒對語言的生物學主張作了許多修正，而原封未動地保留了它的本質。例如，M. 繆勒不說“語言是生物機體”而用了更加委婉的說法“語言是一種有機的活動。”或者說：“語言是機體必需的功能。”

M. 繆勒提出他自己的論證。把“語文學”(филология) 同語言學劃分開來。繆勒一方面把“語文學”看作是研究書面文獻的科學而保留了這個術語的內容，同時把它列入了歷史科學；他把語言學當作自然-歷史科學，研究語言的生物式的發展。這種發展不依賴於講話人的意志，而是依賴於講話人的種族特點。由於把語文學和語言學作了這樣的劃分，繆勒就給予方言以特殊的意義，把方言看作語言生命的真正承擔者，因此它有權利成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繆勒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研究方言的人。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俄國的語言學家布斯拉也夫。然而，由於繆勒的許多實際上只是平平常常的著作，特別是他的“語言科學”(Наука о языке) 一書（俄譯本 1865 年出版）傳播得相當廣。這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了語言學中的一個新部門——方言學的形成。這樣看來，我們可以認為自然主義對語言學有某些貢獻，那就是它承認了研究沒有文字記載的活的語言，研究方言有着特殊的價值。

自然主义学派在語言学思想的發展中的意义就止于此。誠然，这个学派的一些个别代表人物对于科学有一些个人的功績。但是这只是在他們研究或整理語言事实本身，而不是一般論証他們的整个理論的时候才有的。这主要是指約翰·史密特，他到后来成了語言的新語法学說的拥护者。也是指自然主义学派的奠基者奥古斯特·施萊赫尔本人。随后而起的語言学的一个派別——新語法学派对于施萊赫尔在語言学上活动的成果給了一个較为正确的評价。新語法学派的学者們指出，在普通語言学的發展方面施萊赫尔没有什么正确的和有成效的思想，但是他在历史比較語言学方面却作了巨大而有益的工作。施萊赫尔整理了科学上所积累起来的語言材料并且正确地指出了这个材料中的空白点。特别是他結束了对梵語的地位和作用評价过高的現象，而这种現象却是他以前的学者工作中的特点，并且促进了研究科学中很少研究过的語言。施萊赫尔同样也相当地促进了对印欧語系个别語言語言規律的研究工作的發展。

19 世紀的下半世紀，語言学堅決地离开了自然主义的立場。施萊赫尔的原理（即主張語言是一种生物机体，因之語言学也是自然科学的理論）开始受到了严厉的批評，这一时期的語言学家們都力圖把語言看成是民族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現，或者看成是个人精神里的一种观念机构。語言学中这种目的明确的心理学派的基础是由德国的史坦塔尔(H. Steinthal (1823--1899)和俄国的波鉄布尼亞(А. А. Потебня) (1835—1891) 奠定起来的。

史坦塔尔提出了这样一条与語言本質的生物学观点迥然不同的原理，就是語言發展中的一切現象都和某一民族的观念有关，并且是該民族的心理表現。詞和語法形式的一切意义都是邏輯範疇在民族精神里經過主觀加工的产物。这种民族心理規定了語言的内部形式，或者更确切一点說，它就是語言的内部形式。史坦塔尔在他的著作“W 馮·洪堡特的語言学著作”(Di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n Werke W. von Humboldt) (1848) “語言結構重要类型概說”(Charakteristik des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s) (1860) 中，特别是在“从科学上的最新成就看語言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Sprache im Zusammenhang mit den letzten Fragen alles

Wissens) (1888) 一書中發揮了這些思想。

史坦塔爾的基本思想是在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家，所謂“語言哲學”的奠基人威廉·洪堡特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的直接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洪堡特是薩普和格里木同時代的人，但根據他的語言學觀點來看，他卻是屬於後一時期的語言學家。對於他同時代的人來說，他並沒有發生什麼重要影響。在語言學中洪堡特特別是以他的著作“爪哇島卡維語研究”(Ueber die Kawisprache auf der Insel Java) 一書而著名的。這本書的序言題目是“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智力發展的影響。”(Ue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洪堡特是康德和費希特的信徒，這在他的語言學著作中有顯著的表現。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指出洪堡特語言學思想有一定價值的同時，對於洪堡特的唯心主義方法論和局限性作了中肯的說明。車爾尼雪夫斯基堅決反擊了洪堡特認為語言結構決定民族的文化水平的看法。

車爾尼雪夫斯基、柏林維基、杜勃羅留波夫對於語言和人民的聯系問題都很感興趣。對語言本質的自然主義和種族主義觀點是當時國外語言學的特點，而在俄國就沒有得到傳播，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革命民主主義者。革命民主主義者們在自己的文學著作中，在對語文學和民間文學的評論文章中以及在直接闡述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中經常強調語言的人民性，經常強調這樣一個事實：語言是一個民族的全民財產，一種語言無論它具有那種類型的語法構造都完全能夠滿足處於高度社會發展水平的人民對於交際手段和思維工具的要求。

在語言學中，洪堡特第一個提出了語言內部形式這一著名的理論。然而洪堡特的推論過程並不十分清楚，前後也不一致，以致於他的每一個追隨者對於這個理論都各有各的理解。最突出的，例如，波鐵布尼亞一個人在他的著作中對詞的內部形式這個理論就有三種說法。

波鐵布尼亞是俄國心理學派的奠基人。1862 年波鐵布尼亞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書名為“思想和語言”(Мысль и язык)。在這部著作中，他的觀點和洪堡特，特別是和史坦塔爾的思想非常接近，